

〔清〕王士禛 原編 鄭方坤 刪補

五代詩話



中華書局
出版

五代詩話

〔清〕王士禛原編

鄭方坤刪補

〔美〕李珍華點校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北京市冠中印刷廠印刷

書目文獻出版社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毫米 32開本 13.3125印張 280千字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670冊

ISBN 7-5013-0667-2

Z·32 定價：4.90圓

前言

傅璇琮

一九八七年十月至一九八八年五月，我應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人文學系之邀，到該校進行學術訪問。在這期間，我與美籍華裔學者李珍華教授合作，對盛唐時期的文學思想作了一些探索，並就殷璠及其《河嶽英靈集》，王昌齡及其《詩格》，寫了幾篇學術論文，交國內的有關刊物發表。由王昌齡的《詩格》，我們注意到唐代詩學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即由初唐時期上官儀的《筆札華梁》，元兢的《詩髓腦》為濫觴，經盛唐、中唐的發展，而大盛於晚唐五代的詩格型著作。這種詩格型著作，不同於唐以前如鍾嶸《詩品》那樣有一定的論詩宗旨和思想體系，也不同於唐以後如宋人詩話那樣以文藝隨筆漫談詩人之間的交往、詩句的賞析以及某些與詩歌有關的遺聞逸事。它往往採取條目的形式，用數字貫串，成為格式的樣子，內容則以傳授詩歌的格律（尤其是在唐代逐步得到完整的新體詩——律詩和絕句）以及作詩的基本技巧為主。由於帶有傳授知識的性質，因此內容比較通俗，又由於採取條目的形式，就容易使人產生破碎割裂的感覺，而為宋及宋以後評論家所輕視。如宋蔡寬夫《詩話》就以譏嘲的口吻說過：

唐末五代，流俗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為例，議論蜂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見郭紹虞《宋詩話輯佚》）

清人所修《四庫提要》，更對這一類著作採取一筆抹殺的態度，說它們「率出依托，鄙倍如出一手」（卷一九七集部詩文評類存目《吟窗雜錄》提要，又參卷一九五司空圖《詩品》提要）。由於受這種看法的影響，這一部分詩格型著作，長期以來得不到重視，除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個別的前輩學者如羅根澤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曾有所敘述外，一九四九年以後，幾乎沒有專門論文加以研究，出版的幾部有影響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對它們也沒有專門章節論述。

這種現象倒反而引起李珍華先生和我的興趣。李先生在美國曾長期研究和教學歐洲與美國文化史，而又對盛唐文學有專門的研究。他以其廣闊的世界史知識和深湛的文化史研究素養，注意到唐末五代在中國歷史和文學中的特殊地位。於是，在我於美國停留的後期，我們曾對五代的文學和那時的文化思想若幹問題作過較深的交談，並擬着手作一些系統的研究。我們認為，首先一步應弄清基本事實，整理出基本材料，然後才能作理論的、概括的研究。對此，李珍華先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在我們遊歷華盛頓，參觀美國國會圖書館時，他就複印了館藏的《五代詩話》（粵雅堂叢書本），並動手標點起來，遇到錯字缺字，又校閱其他文獻資料，據以正補。我於五月初返國，即攜帶他的點校本，隨後過錄到另一複印件上，並作了少許補充。這就是現在奉呈給讀者的由王士禎原編、鄭方坤刪補的十卷本《五代詩話》。

五代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分裂割據。這時在黃河流域依次存在過年代相當短促的五個封建王朝——梁、唐、晉、漢、周；在長江流域以南至兩廣地帶，按地域分佈及時代先後，則有九個地方政

權——前蜀、後蜀、吳、南唐、閩、吳越、南越、荆南、楚，再加上北方的北漢（相當於現在山西省的大部），歷史上因稱這一時期爲五代十國。這一時期，往往因爲它的時間短促，戰爭頻繁，社會動亂，以及沒有出現過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研究極其不夠。而實際上，五代十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宋代無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是明顯與唐代不同的，有些歷史學家稱宋代是中國的近古時期，從此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到後一發展階段，唐代則可稱爲中古，而由中古到近古，是由五代這六七十年間完成的。五代，它在各方面說是一個過渡，但這個過渡在歷史上却帶有關鍵性質，只有透徹地研究這個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宋代及宋代以後的中國社會諸形態才能有清楚的了解。

宋代有些文獻記載是注意到唐宋社會的重要不同的，如南宋一部很重要的筆記，王明清的《揮麈錄》中說：「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蟬聯珪組，世爲顯著，至本朝絕無聞人。」（前錄卷二）崔、盧、李、鄭是潼關以東的大族，韋、杜是關中的大族，它們代表唐代的門閥世族。王明清說唐朝時這幾個大姓世代做高官，聯綿不絕，但到宋朝，就沒有出過有名人物。這說明唐朝的幾個世家大族，到宋朝已完全衰落，而宋朝就再也沒有產生過象唐朝崔、盧、李、鄭、韋、杜那樣能交通聲氣、把持政權，又連綿世代的門閥。這既是政治的變化，更是土地占有形態的變化——由領主莊園制向一般地主占有制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是在五代完成的。

也是從五代開始，長江流域的經濟明顯超過黃河流域。這不僅表現在農業上，而且表現在商業和

手工業上。五代時南方較為安定，戰亂較少，又因水路運輸的便利，促進商業的發達。而沿着水路，就有新的城市興起，這些城市所代表的文化形態，明顯地與北方黃土地帶不同。這對宋以後的文學顯然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唐詩是中國詩歌的高峰，宋詩是又一個高峰，它與唐詩比較有不同的風貌，而唐末五代正是詩歌風格的轉變時期。宋代不少詩人和評論家已經注意到唐末五代詩歌通俗化的傾向。雖然他們當中有些人不無帶着偏見，看到唐末五代詩人語言的淺顯而譏評其詩格不高。如對北宋頗有影響的唐末五代初詩人鄭谷，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說他「格不甚高」，就因為他的詩句多淺顯明白，「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歐陽修自己也承認「余為兒時猶誦之」。又如宋人筆記《遜齋閑覽》說：「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為多。」《唐詩紀事》說晚唐詩人盧延讓：「延讓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語。」以致著名的西昆體詩人楊億在任翰林學士，與皇帝談起盧詩時，君臣都不得不承認「似此淺近，亦自成一體」（卷六十五）。這種從唐末開始的詩歌語言日常生活化、通俗化的趨向，對宋詩風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響。五代時除了詞以外，在詩和文方面確實沒有出現過大家，甚至二流作家也沒有，這可能正是過渡時期的特色，它代表一個時期的終結，而又未能有足以表現新時期特色的成熟的作家產生，它所表現的是一種趨向，一種潮流，這種趨向和潮流的發展，是會促進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和新一代獨具特色的文學家的崛起的。

清代乾隆年間，李調元編《全五代詩》，他在自序中說：「五代詩向無全本，編詩者率皆附之唐末宋

初之間。」這幾句話確實反映了過去對五代詩的看法，也說明爲什麼五代詩文研究薄弱的原由。那就是，長時期內是不承認五代文學是作爲一個獨立的階段存在的，這時期的作家，不是上屬於唐，就是下綴於宋。如宋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元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就收了不少五代詩人。清編《全唐詩》，更將五代詩人幾乎全部收入，一直編到由五代入宋的詩人如徐鉉、孟賓于等。厲鶚的《宋詩紀事》、陸心源的《宋詩紀事補遺》等又採輯了不少五代後期的詩人。五代時代短促，詩人生活年代超越於朝代的更替，這固然是客觀的原因，但過去長時期中對五代文學的漠視主要還是觀念上對文學變遷階段性認識不足。

現在要改變這種情況，就是說要改變這種認識，我認爲首先還是要理清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文學史研究，如同歷史研究一樣，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過於強調研究規律，似乎在一部書中，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只有能提出或發現什麼規律性的東西，才是高水平的研究。當然，如果作爲整體的要求，我們研究歷史和文學史，以求達到揭示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是可以的，但那是何等的不易，恐怕要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積累相當的成果，才能逐步有所收穫。而歷史研究的任務，有一點却被許多人所忽略，那就是要把歷史事實搞清楚。歷史上的一個個事件，一次次潮流，歷史人物的種種活動，其真相究竟如何，它的來龍去脈，它的矛盾的各個側面，真實情況是怎樣的，這不但對於近現代史是重要的，對於古代史也是重要的，對於政治史是重要的，對於文學史、思想史以及其他意識形態領域的歷史，也是重要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不清理基本事實，而議論什麼規律或所謂宏觀研究，只不過是侈

談。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如果到現在還不重視歷史過程的周密而客觀的研究，那只能是原地踏步，即使寫出多少大的論著或編出多少大的工具書，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而在文學史上，我們應該進行這樣的研究而至今還是十分薄弱的，正不知有多少，五代文學只不過是小焉者而已。

我想這不應該引起誤會，以為我在這篇序言中單純地來提倡材料考證、文獻整理，而反對必要的理論探索。我只不過想為被某些論者貶為「低層次」的研究說幾句話，而且我也確實認為，這些年來，古典文學研究還是在腳踏實地前進，很有幾部扎實的著作產生，並不象有些文章所說的陷於危機，或所謂「中國有古典文學，而沒有古典文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的羅宗強同志於今年六月間給筆者的一封信中，談到他看了目下幾篇議論古典文學研究的文章，這些文章「幾欲否定一切」，他頗不以為然，而「以為近幾年古典文學研究，實正在堅實地前進，與彼等之評價全相反」。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陳允吉同志近日來信，其中說：「對於事物的本質抽象，是始終離不開對具體現象的把握的，我國古代哲學史上很早就提出『理事相即，體用一如』，已把事物本體與功用，本質與抽象之間的關係講得十分透徹。現在有些人提倡的所謂『宏觀研究』，不過是承襲宋明之間空談性理之積弊，此亦拾人之唾餘而氣勢愈壯者耳，求其有益於學術事業之發展者，真百不得一。數日前趁雜事稍了，取章學誠之《文史通義》隨便翻翻，覺得裏面有些話說得真好。章氏屢次講到『道不離器』，告誡讀者不可舍器求道。又云『談理不可徒托空言，必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對照近年那些滿紙術語、內容空洞的宏觀文章，章學誠這些話真是一劑良藥。」古典文學界中許多人是知道羅、陳兩位的，他們的論著注重客

觀材料，但他們並不是專門作考證的。宗強同志有一套古代文學思想史的宏偉計劃，已經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真使人耳目一新，書中提出和解決了多少我們朦朧感覺到但還不能清晰認識到的隋唐文學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這正是他長期來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結果。允吉同志近些年來致力於佛教思想對唐代詩人影響的研究，他的文章談到了李賀作品奇特想象背後的禪理滲入，王維詩畫中的禪學和詩人終究擺脫不開的世俗觀念，唐朝寺院壁畫對於韓詩風格的影響，這些文章好象給研究者打開一扇扇窗戶，讓人們重新認識唐代文學的環境和詩人們的心靈。如同其他一些有創見的論著一樣，羅、陳兩位都是充分運用材料，提供事實本身，客觀地剖析事件的發展過程。如果離開文學史的事實，我們能作出多少宏觀的理論研究來呢？

話說得遠了，還是讓我們回過頭來說五代文學。我覺得，從理清基本事實這一角度來說，五代文學需要做的事情實在不少，而前人的記載，謬悖與缺漏之處可謂觸目皆是。我本人在這方面用功還不多，現在姑就兩件小事，作為例子，來看看擺在我們面前應該做的工作有多少。

貫休是唐末五代最有名的詩僧。他交友廣闊，由唐人五代的幾位著名詩人，如韋莊、韓偓、吳融、鄭谷，與他都有詩什唱酬。他的遊踪也甚廣，除出生地浙江外，現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都有他的蹤迹，晚年則又定居於蜀。關於他由吳越入蜀的原因，過去的記載就有不少互相矛盾的說法。

北宋中期與歐陽修大致同時的僧人文瑩，在其《續湘山野錄》中記道：「唐昭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於越，拜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撰謝表，略曰……。殆莊宗人

洛，又遣使貢奉，懇承旨改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卽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曰：「貴極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空羨當時萬戶侯。」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爲四十州，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餅一鉢垂垂志，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厚遇之。」

這裏記貫休投詩的時間不很清楚，似乎在唐昭宗因錢鏐平董昌而封其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及後唐莊宗賜以玉冊、金券，以及錢鏐自稱國王以後，而貫休入蜀，以詩投獻者爲孟知祥，孟知祥則爲後蜀開國主，建國於公元九二五年，這時貫休死已十餘年。

南宋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卷七十五貫休條也記此事：「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鏐諭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唐詩紀事》明確說貫休投詩時錢鏐已自稱爲吳越國王，不過他說貫休入蜀，所投者爲王建，王建爲前蜀開國主。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十貫休傳記此事：「初，昭宗以武肅錢鏐平董昌功，拜鎮東軍節度使，自稱吳越王。休時居靈隱，往投詩賀，中聯曰：『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大喜，然潛侈之心始張，遣諭令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性躁急，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余孤雲野鶴，何天不可

飛！』即日裹衣鉢拂袖而去，至蜀，以詩投孟知祥云……」此處把錢鏐平董昌、封鎮東軍節度使與自稱吳越王，時間聯繫起來，而以貫休獻詩即在平董昌、受封鎮東時，至於入蜀，則與《續湘山野錄》所記同，以爲後蜀主孟知祥。

清代初期，以博洽著稱的吳任臣《顧炎武在廣師》一文中曾說「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曾彙集文獻，作《十國春秋》，是記載五代史事的一部名著，其書卷四十七前蜀有貫休傳，中說：「乾寧中，謁吳越武肅王，獻詩曰：『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王命改爲四十州，乃可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不可飛！』」（原注：一云貫休投詩於武肅，甚愜旨，遺贈亦豐。王立功臣碑，列平越將校姓名，遂列貫休詩於碑陰，見重如此）。《十國春秋》明確載貫休投詩在「乾寧中」。乾寧爲唐昭宗年號（八九四——八九八）。

關於貫休投詩之事，影響至廣，《全唐詩》卷八三七即收入此詩，題《獻錢尚父》，題下小注，述其本事，大體本《唐詩紀事》，謂「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之」云云。《五代詩話》卷八於貫休名下也有同樣的記載。今人的文章中，也有援以爲據的，如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歷史研究》上喻松青《〈轉天圖經〉新探》一文，正確考證了《轉天圖經》的識文係指錢鏐，糾正了以往的一些說法，但其中的一個論據，則仍據《唐詩紀事》的記載，並據以論證說：「可以看出，錢鏐生於亂世，獨霸一方，並不以此爲滿足，懷有一統天下的野心。」

經過對史料的考核，我認爲，關於貫休向錢鏐投詩一事，是根本不存在的，這首詩也出於後人依

托，非貫休所作，諸書中之所以出現歧異的說法，最基本的原因也就因為它本身即出於臆造。

今存貫休詩有四部叢刊本《禪月集》二十五卷，係武昌徐氏所藏影宋鈔本，前有吳融序，末有貫休弟子曇域後序，是現存最早的貫休詩集。貫休生前曾囑託曇域為編定其詩集，現在這部二十五卷本的《禪月集》首尾完整，似即為曇域所編之本而在後世未曾散失者。在這部詩集中，就沒有以上各書所記述的向錢鏐投獻的詩。

據《通鑑》，董昌於越州稱帝在昭宗乾寧二年（八九五），同年四月，錢鏐上表稱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六月，以錢鏐為浙東招討使，擊討董昌。時錢鏐為鎮海軍節度使，十二月，加兼侍中。乾寧三年（八九六），五月，錢鏐克越州（今浙江紹興），斬董昌。十月，從錢鏐之請，以鏐為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為鎮東軍。——以上是錢鏐攻討、平定董昌的大略，問題是，乾寧三年前後，貫休是否有可能在錢塘（杭州）？

《新唐書》卷二〇三《文藝傳》下《吳融傳》云：「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為左補闕。」沒有記載吳融這次貶官及召回的年月。按吳融有《禪月集序》（《全唐文》卷八二〇），說自己已在荆南與貫休交遊凡一年有半，「丙辰歲余蒙恩召歸」。丙辰即乾寧三年。《全唐詩》卷六八六載融《南遷途中作七首》，首為《登七盤嶺二首》，其一云：「才非賈傳亦遷官，五月驅羸上七盤。從此自知身訂定，不能回首望長安。」可知赴貶所在五月。由以上兩條材料，可考知吳融貶荆南當在乾寧二年五月，而其應召回京則在第二年冬。融有《赴闕次留獻荆南成相公三十韻》（《全唐詩》卷六八五），可證

《新唐書》所謂依荆南成汭也是可信的。

吳融一到荆南（江陵），即與已留居於那裏的貫休交酬，直至他於乾寧三年冬回朝，貫休還請他爲自己的詩集撰序。吳融《禪月集序》詳敘其經過云：「貫休，本江南人，幼得苦空理，落髮於東陽金華山，機神穎秀，止於荆門龍興寺。余謫官南行，因造其室，每談論，未嘗不了於理性。自旦（本作是，據四部叢刊本《禪月集》改）而往，日人忘歸，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戚。此外商榷二雅，酬唱循環，越三日不得往來，恨疎矣。如此者凡晷有半。……丙辰歲余蒙恩召歸，與上人別，袖出歌詩草一本，曰《西岳集》，以爲贐矣。」融另有《訪貫休上人》詩（《全唐詩》卷六八六）：「休公爲我設蘭湯，方便教人學洗腸。自覺塵纓頓瀟灑，南行不復問滄浪。」貫休也有《送吳融員外赴闕》（同上卷八三一）。都可見出兩人交契之深。

貫休又有《江陵寄翰林韓偓學士》詩（《禪月集》卷十二）：「久住荆溪北，禪閑掛綠蘿。風清閑客去，睡美落花多。萬事皆妨道，孤峰謾憶他。新詩舊知己，始爲味如何。」據此，則作此詩時貫休在江陵，且爲時已久：「久住荆溪北」。據岑仲勉先生《補僖昭哀三朝翰林學士記》，韓偓之人翰林，當在乾寧四年（八九七）後，光化元年（八九六）前。這也就是說，貫休在乾寧四年、光化元年間仍居住在江陵，未曾離開過。而據前所述，錢鏐以兵討董昌在乾寧二年六月，平董昌在乾寧三年六月，任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在同年十月，則貫休以詩相賀，或如《十國春秋》小注所言，錢鏐以貫休詩刊於平越功臣之碑陰，都於時、地不合。

又據《舊五代史》卷一三三《錢鏐傳》，鏐平董昌後，兼鎮海、鎮東兩鎮，亦即兼杭、越二鎮，但此時北有楊行密，時相侵攻，《舊五代史》說此時「鏐所部止一十三州而已」。至天復（九〇一——九〇四）中，與楊行密部將田頔戰，雙方還時有勝負，時「其父寬每聞鏐至，走竄避之，鏐即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園爲事，未嘗有貴達如此。今爾爲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以不忍見汝。』」由其父所言，則此時錢鏐雖有割據之意，但勢力尚弱，強敵甚多，不可能明張旗幟，作「四十州」之大言。且其父口口聲聲稱「十三州」，《舊五代史》也說是十三州，何來貫休之十四州？《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吳越世家》：「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可見鏐之爲吳越王，乃朱梁所授，鏐終其身不過想建立一個割據政權，以作孫權爲滿足。《新五代史·吳越世家》又載梁乾化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朱友珪於錢鏐爲後輩，故可稱之爲尚父，而朱溫時決不可能如此。乾化二年爲公元九一二。據雲城所作《禪月集後序》，貫休卽於此年卒於蜀，年八十一，當然更不可能遠至錢塘作賀詩，由此可見《全唐詩》將此詩詩題作《獻錢尚父》是何等的荒謬。至於錢鏐自稱吳越國王，則在後唐莊宗時，爲時更晚，已是貫休卒後好些年了。

以上是從北宋以後相傳已近千年的託名於貫休的一首僞作，現在再談韋莊的一首佚詩。

韋莊是在唐昭宗天復元年辛酉（九〇一）入蜀的（韋藹《浣花集序》：「辛酉春，應聘爲西蜀奏記」），從此卽仕於蜀，王建開國後，位至宰相。他的詩，今存約三百二十餘首，比起其弟韋藹《浣花集序》所說

的「千餘首」，三分之一還不到，可見散佚頗多。《浣花集》是昭宗天復三年（九〇三）所編，那時韋莊還在世，因此韋藹在序中說「餘今之所製，則俟爲別錄，用繼於右」。可見今存《浣花集》都是韋莊入蜀前所作，而且這也幾乎是現在所能見到的韋莊詩的全部，韋藹所謂「餘今之所製」，後來並未編集。韋莊入蜀後的創作，詞應當是主要的，也是他全部創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但是他的詩，特別是七言律絕，於艷麗中見清秀，在唐末五代也應推爲名家。他入蜀前漂泊各處，隨遇觸發，寫了不少詩，入蜀後主要從事政治活動，官位高了，生活安定了，詩作當是少了一些，但不應一首也沒有留存。作爲作家的整體研究，他的前後期作品，包括詞和詩，應當統一來考慮的。但可惜後期詩作的蒐輯，就已有的成績，却未甚理想。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向迪琮先生輯校的《韋莊集》，對韋莊詩作了較爲系統的編次，也未輯有仕蜀以後的詩。

經查四部叢刊本《禪月集》，發現貫休入蜀後，曾與韋莊有詩唱和，從貫休詩中，我們可以窺見韋莊後期詩作的一些情況及韋莊的某些生活情趣。如卷十二有《和韋相公見示閑卧》詩，中云：「堂懸金粟像（自注：相公常供養維摩居士），門枕御溝泉。且沐雖頻握，融帷孰敢褰。德高羣彥志，善植幾生前。……扶持千載聖，瀟灑一聲蟬。棋陣連殘月，僧交似大顛（自注：韓吏部重大顛禪師）。」卷十三又有《和韋相公話婺州舊事》，是關於韋莊早年寓居浙江東陽時，貫休與之交遊的回憶。值得注意的是卷十九保留有完整的韋莊一首七律，題作《韋相公莊寄禪月大師》，詩爲：「新春新霽好晴和，間闌吾師鄙忤多。不是爲窮常見隔，祇因嫌醉不相過。雲離谷口俱無著，日到天心各幾何。萬事不如棋一局，雨

堂閑夜許來麼？」此詩之後又有題作《酬韋相公見寄》詩：「鹽梅金鼎美調和，詩寄空林問訊多。秦客弈棋拋已久，楞嚴禪髓更無過。萬般如幻希先覺，一丈臨山且奈何（自注：日到天心乃相公之日，老僧日去山一丈耳）。空飄平津好珠玉，不知更得及門麼？」顯然，前一首應是韋莊的原唱，後一首是貫休依韻而作的和什。韋莊詩中有「日到天心各幾何」句，因此貫休詩中注道：「日到天心乃相公之日，老僧日去山一丈耳。」從這兩首詩的編次，更可以看出四部叢刊本的《禪月集》確是較早的，說不定即是曇域所編之本。唐宋人編集往往把別人的和作都編進去，讀者若不細察，就容易誤認爲都是本人的作品。這首編入貫休集中的韋莊的詩就長期未被人發現。《全唐詩》輯韋莊詩爲六卷，前五卷（卷六九五—六九九）即《浣花集》中詩，第六卷（卷七〇〇）爲補遺，即漏載此詩，只在卷末的佚句中載「豈是爲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過」二句，謂出自《高僧傳》，而不知全詩見《禪月集》。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外編》，收王重民、孫望、童養年三位先生所輯唐詩，於韋莊名下也未載此詩。夏承燾先生往年作《韋端己年譜》（見《唐宋詞人年譜》），記韋莊與貫休在蜀中有詩唱酬，亦未及此詩，却云：「《禪月集》多和端己詩，端己原作，惟存《閑臥》詩斷句數語耳。」其實《禪月集》中貫休僅題云和韋《閑臥》詩，未有韋之斷句，未知夏《譜》何所據而云然。但由此也可見夏先生是查閱過《禪月集》的，而竟未檢出韋莊之《寄禪月大師》一詩，也不可不論是失之眉睫了。

以上兩點，即所謂貫休獻錢鏐詩及韋莊的一首佚詩，在五代文學中算不了什麼大事，而且也並不難於解決，而竟長期未能發現，這說明我們確實需要從頭由清理材料着手，踏踏實實地把五代文學中

存在的問題搞清楚。而與此同時，選擇一些前人已經下過功夫的著述，如李調元的《全五代詩》，王士禛、鄭方坤的《五代詩話》等，作一些必要的整理，加以出版，供研究者參考，在目前有閱資料仍感缺乏的時候，也實在是很有必要的。《全五代詩》這裏不談，我現在只就我所了解的《五代詩話》的情況向讀者作一些介紹。

《五代詩話》十卷，計卷一國主、宗室，卷二中朝，卷三南唐，卷四前蜀、後蜀，卷五吳越、南漢，卷六閩，卷七楚、荆南，卷八宮闈、女仙鬼、緇流，卷九羽士、鬼怪，卷十雜綴。署爲王士禛原編，鄭方坤刪補。王士禛爲清初詩壇的大家，他雖主神韻，推崇盛唐，但對中晚唐詩也不偏廢。《五代詩話》是他晚年家居時所作，係輯集衆書而成，雖是述而不作，但他能注意五代詩，可見他的眼光已非一般宗唐、宗宋的門戶之見所能牢籠的了。不過這是一部未完稿。據鄭方坤序：「向聞漁洋先生有《五代詩話》秘本，未經鏤版，見者絕希。近始於歷亭朱氏處乞付鈔胥，披覽之餘，知爲先生暮年手輯，未及成書，不精不詳，其有待於後人之修潤者正復不少。」鄭《序》說此書未經鏤版，倒是不確的，據《四庫提要》卷一九七集部詩文評類存目，即有宋弼等補輯本，十二卷。《提要》說：「是書士禛原稿，本草創未竟之本，弼所續入，務求其博，體例遂傷冗雜，殊失士禛之初意，而掛漏者仍復不免。後鄭方坤重爲補正，乃斐然可觀，是編精華，已盡爲方坤所採，方坤所不採者，皆糟粕矣。」可見宋弼補輯本因質量差劣而未獲留傳。

王士禛一生著述甚豐，但經查閱有關他的傳記資料，發現都未有記載他曾作過此書。如《漁洋山人自撰年譜》，是他晚年罷官家居時總結其一生所作，初成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時年七十二，